

#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

——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庄亚琼

**【提要】**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史表 欧美 中西史学

史表是中国传统纪传体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按不同主题、依时间顺序所作的事项式历史书写。《史记》十表与《汉书》八表并为中国古代史表书写的奠基之作,是中国史学文化的独特体现。国内学界对《史记》《汉书》史表的讨论自汉代绵延至今,相关成果不胜枚举。<sup>①</sup> 相较而言,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渐次发展出多种面向的研究实践,极大增进了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了解。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之所以值得关注,是由于其具有两个层面的典型意义。其一,对于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及其发展历程具有典型意义。从欧美汉学整体来看,中国史学受到的关注始终少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sup>②</sup> 在此情况下,通过分析欧美学者围绕《史记》《汉书》史表形成的研究脉络,可以以点带面,深化对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特点的认识。其二,部分欧美学者通过辨析《史记》

① 这些成果已有若干整理汇编,如《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研究资料萃编》的相关部分等。总的来说,国内学界研究《史记》《汉书》史表大致可分为注疏式研究与专题式研究两种形式。其中,注疏式研究基本依循史表固有形态进行校补、考证与评析,典型作品如汪越《读史记十表》、夏燮《校汉书八表》等(参见梁玉绳等:《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吴树平等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专题式研究则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讨论(如,张大可:《论〈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或专研史表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如,丁波:《关于〈史记·将相表〉的倒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或利用史表所载信息开展其他方面的史学研究。

② 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例,该丛书自1988年发行,至2022年4月已翻译引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海外中国学代表著作211种,其中仅有《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与《〈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两部以中国史学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著作。虽然海外中国学成果的翻译引进数量并不等同于海外中国学成果本身的数量,但也可见一斑。

《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其研究本身作为中西史学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也有较高的分析价值。

鉴于国内学界对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及其衍生问题的了解尚不深入,<sup>①</sup>且既有的欧美史学研究并未深入比较中西古代史表书写、阐发双方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本文拟从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发展趋势入手,评析其研究内容、特点,着重讨论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对西方史学议题的回应及中西史学互鉴的意义,最后尝试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参照对象,比较分析中西方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及成因,抛砖引玉,以资推进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 一、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发展趋势、特点与问题

从研究形式上看,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可分为译介研究与专题研究。译介研究方面,法国沙畹(Edouard Chavannes)、美国华兹生(Burton Watson)、荷兰何四维(A. F. P. Hulswé)分别翻译了《史记》《汉书》史表中的部分篇目;在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史记》《汉书》史表本身的内容、性质、作用等专门议题,英国鲁惟一(Michael Loewe)、美国侯格睿(Grant R. Hardy)、戴梅可(Michael Nylan)、加拿大方丽特(Griet Vankeerberghen)则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讨论。从成果发表的时间分布上看,大致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此后的研究无论在内容体量还是认识深度上都有了长足发展。总的来说,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在发展中呈现两方面趋势。

### (一) 研究深度不断拓展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源于对《史记》的整体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畹在翻译《史记》时纳入了十表(包括表序与其中内容),并在译本前言中强调十表是司马迁“不容忽视的”原创性史学贡献。<sup>②</sup>在之后一个多世纪中,沙畹《史记》十表译介是欧美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时最主要的参考之一,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沙畹的《史记》十表译介并非简单的对应翻译。实际上,除了直译表序与“太史公曰”,沙畹译本几乎彻底改变了《史记》十表的固有形态,其中只有《秦楚之际月表》配有若干张独立的时间对应表,其他九篇则采用世系排列结合文字表述的形式。例如,沙畹译本虽保留了《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分设两篇的设置,但其《十二诸侯年表》部分仅有表序与“太史公曰”,而将合并后的周与鲁、齐等13诸侯的世系列表全部置于《六国年表》中。<sup>③</sup>

沙畹为什么在译介过程中放弃了《史记》十表原有的表格形态呢?究其原因,除了其自言的“印刷排版考虑”,<sup>④</sup>也有研究意识上的欠缺。沙畹对《史记》十表的关注集中于表中所载信息(如通过合并《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集中呈现诸侯世系信息),而在论及《史记》的史学方法时,甚至认为“司马迁的表不能引发任何就其形式的批评,对其实质内容的讨论并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考证问题……这些表虽然对读者多有助益,但在史书中并非不可或缺”。<sup>⑤</sup>虽然沙畹这一结论源于其观察

① 庄亚琼:《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3期。

② Édouard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Tome premier, Ernest Leroux, Editeur, 1895, p. CLXXIV.

③ Édouard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Tome troisième,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 Maisonneuve, 1967, pp. 29-46.

④ Édouard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Tome troisième, p. 1.

⑤ Édouard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Tome premier, p. CLXXVII.

到另有许多纪传体正史不设史表,但也反映出早期欧美学者对《史记》十表史学意义(如划分历史阶段、表述历史大势等)的认识尚不全面。

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中叶华兹生的《史记》研究中也有一定体现。虽然华兹生在引用赵翼、日本武田泰淳相关评述的基础上,称赞了《史记》十表具有整合历史信息、表达司马迁原创性见解的积极作用,但并未更多关注十表本身的史学内涵。<sup>①</sup>

可以说,直至20世纪90年代,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深度相对有限,对史表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其是纪传体例组成之一,乃至对史表本身的价值有一些偏颇的看法。除沙畹之外,荷兰曼斯维尔特-贝克(B. J. Mansvelt-Beck)也认为,表在纪传体史书中可有可无,因为“表中的所有信息——任职、封爵和其他的国家行动——应该都可以在前三种体例(纪、志、传)中找到”。<sup>②</sup>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开始聚焦于《史记》《汉书》史表本身的史学内涵与意义。如侯格睿专门探讨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独立的历史解释功能;鲁惟一在综合介绍《史记》《汉书》史表的基础上,细致比较了两者的内容差异;方丽特则着重分析了《史记》十表如何作为一种纪念性的史学形式,讲述了“独特的中国历史故事”。

与此同时,部分欧美学者也通过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提升了《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认识深度。近年来,西方史学中出现了一种从图像性角度分析史表书写的新趋势,其代表作品即美国丹尼尔·罗森伯格与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合著的《时间制图学:时间轴的历史》。该书强调史表是一种依赖平面视觉形式的特殊历史书写,反映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过去及未来的构想”,<sup>③</sup>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意义。虽然该书的讨论范围仅限于西方史表,但部分欧美学者很快将其研究思路运用于《史记》《汉书》史表的分析。如戴梅可认为,《史记》《汉书》史表以平面形式呈现历史信息,勾勒了历史交汇的复杂轨迹,具有历史认识上的开放性与多样性,是司马迁与班固等表达历史观点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例,她认为表中“如同持续不断的鼓点一样”反复出现的“国除”一词,与周围的空格共同组成一种图像式的信号,从视觉效果上烘托出西汉初年政治斗争的残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等则通过变化设计,极大消解了类似“无言之文”形成的视觉冲击。在她看来,史表绝非一连串人物、时间与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类似图的平面式历史书写,帮助其读者观察“那些影响王权统治成败的更大的模式”。<sup>④</sup>

归纳而言,欧美学者对《史记》《汉书》史表的认识,从关注史表作为纪传体例组成的部分史学功能,深化至专门探讨其性质、内涵,同时积极借鉴当代西方史学研究思路,整体呈现出从浅到深、从片面到全面不断拓展的发展趋势。

## (二) 研究领域逐渐丰富

从不同视角细化讨论《史记》《汉书》史表,丰富具体研究领域,是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另一大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13 - 114.

② B. J. Mansvelt-Beck, *The Treatises of Later Han*, E. J. Brill, 1990, p. 1.

③ Daniel Rosenberg and Anthony Grafton, *Cartographies of Time: A History of the Timelin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10, pp. 10 - 11. 该书中文译本,丹尼尔·罗森堡、安东尼·格拉夫顿:《时光的制图学:由时间轴拉开的人类文明史》,叶品岑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17年版;丹尼尔·罗森伯格、安东尼·格拉夫顿:《时间图谱:历史年表的历史》,杨凌峰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

④ Michael Nylan, "Mapping Time in the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表,"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o. 43, Special Issue on Numerical Tables and Tabular Layouts in Chinese Scholarly, 2016, p. 66.

### 1. 考辨史表内容

《史记》《汉书》史表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脉络式呈现,其记述内容往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然而,部分史表内容与纪、传等其他部分的对应内容、《史记》史表与《汉书》史表所载信息之间或有抵牾,如何考辨这类问题,是欧美学者理解、运用《史记》《汉书》史表时面对的首要问题。

就此,欧美学者积极吸收、整理了历代《史记》《汉书》史表的注疏、考据成果。何四维在译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帝高后文功臣表》时,详细介绍了表中功、侯、食封等概念,比较了《史记索隐》、班固《十八侯铭》及颜师古注《汉书》中汉初 18 功臣位次的抵牾问题,并对表中出现的“客”“中涓”“谒者”等职官信息加以辨析。在其译文部分,何四维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与王先谦《汉书补注》作为底本,同时参考了沙畹《史记》法译本、华兹生《史记》英译本、德效骞(Homer H. Dubs)《汉书》英译本的相关译文,并依据哈佛燕京学社所编汉学《引得》(*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补充了《史记》《汉书》其他章节的相关内容。<sup>①</sup> 鲁惟一则在参考《汉书补注》《史记会注考证》《史记志疑》等材料的基础上,详细归纳了《史记》史表的汉代部分与《汉书》史表在内容上的差异,并加以评判。<sup>②</sup> 举例来说,《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公孙贺于元朔五年(前 124 年)四月丁未封侯,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其封侯于元朔五年四月丁卯。鲁惟一一方面归纳、标注了该条内容于不同文献中的具体位置,另一方面根据干支纪日,指出元朔五年四月并无丁卯日,因此《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sup>③</sup>

从学术价值上看,由于《史记》《汉书》史表的史料信息量庞杂,相关考据分析又往往散见于不同学者的不同著作,想要详尽了解的难度较大。何四维、鲁惟一等欧美学者对史表内容的考辨分析,不仅客观上起到了向欧美学界介绍中国传统史学成果的作用,也为后续欧美学者准确理解、运用《史记》《汉书》史表打下了基础。

### 2. 辨析史表体例

体例问题是《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欧美学者细致剖析的焦点问题。出于语言差异,中国学者多以“经纬变化”表述史表的体例设计,而欧美学者普遍以“横向史表”与“纵向史表”来表述。如在鲁惟一的论述中,“横向史表”指的是时间与事件发展皆是从右向左依次推进的史表(如《史记》前五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纵向史表”则由彼此并列的项组成,信息以从上向下的时间顺序排列(如《史记》表六至九、《汉书》表二至六)。从研究方法上看,欧美学者对《史记》《汉书》史表体例设计的分析,呈现鲜明的比较研究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比较史表的不同设计及作用。如,鲁惟一比较了“横向史表”与“纵向史表”各自的优劣势,认为横向史表有秩序井然的优点,但固定的列项单位会限制其容纳的信息体量;纵向史表的优点则在于可以通过拓展列项使史表容纳更多内容,但缺点是,如果其中某列内容错乱、损佚,则很难复

① A. F. P. Hulswé, "Founding Fathers and Yet Forgotten Men: A Closer Look at the Tables of the Nobility in the 'Shih chi' and the 'Han shu'",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75, Livr. 1/3 (1989), pp. 43 - 126.

② 参见 Michael Loewe, *The Men Who Governed Han China: Companion to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 Leiden, Brill, 2004, pp. 215 - 249.

③ Michael Loewe, *The Men Who Governed Han China: Companion to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 Leiden, p. 232.



原,且后代学者也可轻易补窜纵向的史表。<sup>①</sup>方丽特则聚焦《史记》十表的不同设计,分析其反映的不同历史观念,认为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横向史表中,各个诸侯国的时间线彼此平行,“暗示中央王朝与各个诸侯共享权力……反映了一种与过去连绵不断的、家庭式的历史范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纵向史表则是“官僚阶层模式”的呈现;《汉书》史表主要采用纵向形式,即是地方诸侯权力衰弱的一种反映。<sup>②</sup>

其二,比较《史记》表与《汉书》表的变化及观念差异。不同于郑鹤声等国内学者批评《汉书》八表的设计变化,<sup>③</sup>以鲁惟一、戴梅可为代表的欧美学者普遍强调《史记》《汉书》史表不同的形式设计是为了适应双方不同的史学目的,并不评判两者的高下优劣。如,戴梅可认为《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汉书·诸侯王表》的设计差异,在于两者有意突出不同的时间、地点与人物;相较而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更易凸显西汉前期中央王朝与诸侯国的复杂关系。<sup>④</sup>

### 3. 深入特殊议题

围绕《史记》《汉书》史表产生了若干广受讨论的史学议题,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实叙“十三诸侯”、《汉书·古今人表》的性质问题等。欧美学者在论及这类特殊议题时,普遍对学术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在辨析各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个人见解。如,在分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时,侯格睿、鲁惟一、戴梅可等详细归纳了过往学者认为“十二”诸侯或不包括鲁,或不包括秦,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虚指等观点,并普遍认可明末清初学者傅占衡“十二诸侯不数鲁”的相关论证。<sup>⑤</sup>再如,针对如何理解《汉书·古今人表》这一著名的特殊篇目,戴梅可一方面赞同中国学者王利器推测《古今人表》类似一种辅助记忆的“早期字典”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提出《古今人表》的作用可能在于,“充当宫廷中论辩辞章所需的历史例证的资料库”,其分类表的形式不仅有助于使用者记忆众多的历史人物,也便于他们依循“朝廷允许的、附加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的评价”。<sup>⑥</sup>

除了关注《史记》《汉书》史表自身的议题,部分欧美学者也尝试运用《史记》《汉书》史表进行其他史学讨论。如,何四维通过统计《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帝高后文功臣表》二表中功臣的具体组成,回应了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汉初功臣的若干论断。在何四维看来,赵翼“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判断有其合理性。“在汉代初年,有相当多的平民取得了国家的最高职位,这从一个简单的枚举就可以看出……(二表中)154位新贵族中的48人或者说近三分之一的人,获得了帝国的最高职位。”然而,何四维并不同意赵翼所论汉初功臣“多无赖亡命之徒”的看法。他进一步统计了二表所记功臣最初加入刘邦阵营时被授予的不同称谓,即客、中涓、谒者、舍人、执盾、卒、都尉

① Michael Loewe, *The Men who Governed Han China: Companion to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 Leiden, pp. 212–213.

② Griet Vankeerberghen, “The Tables (*biao*) in Sima Qian’s *Shi ji: Rhetoric and Remembrance*,” in Francesca Bray,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and Georges Métaillie, eds.,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Warp and the Weft*, Brill, 2007, p. 303.

③ 具体来说,郑鹤声认为《汉书》将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分置两表,抹除了西汉初年亲疏相错的态势,且史表本应描绘“兴亡治乱之大略”,但《汉书》八表在设计上“苟欲自出机轴,尽变子长之例”,使史表犹如谱牒,极大削弱了史表“观天下之大势”“观一时之得失”的史学功效。郑鹤声:《史汉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152页。

④ Michael Nylan, “Mapping Time in the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表”, pp. 76–77.

⑤ Grant R. Hardy, “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Shih Chi* 14, ‘The Table by Years of the Twelve Feudal Lor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3, No. 1, 1993, p. 17; Michael Loewe, *The Men Who Governed Han China*, p. 218; Michael Nylan, “Mapping Time in the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表”, pp. 103–105.

⑥ Michael Nylan, “Mapping Time in the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表”, pp. 92–94.

等,并一一分析其中的人员构成及身份背景,指出:“这些人功业的终点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们的起点则相对模糊。”<sup>①</sup>赵翼所论汉初功臣“多无赖亡命之徒”,应是主要依据列传部分得出,而非广泛参考《史记》《汉书》二表中所录功臣出身的整体比例,因此并不准确。<sup>②</sup>

纵观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学术实践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广泛吸收既有研究观点,充分重视传统考据成果。欧美学者较为全面地吸收、借鉴了中外历代《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成果,同时并未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层面,而是在诸种观点中有所取舍、评判,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注疏考据成果的整理归纳,极大增进了欧美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及旨趣的了解。第二,研究形式丰富灵活,讨论范围相对全面。欧美学者广泛采用译介研究与专题研究等多种形式,在追求学术分析深度的同时,兼顾方便欧美读者理解的实用性考虑。其研究对象基本涵盖了《史记》《汉书》史表内容、形式、学术史等诸多层面,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全面讨论。第三,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拓展史表研究新空间。部分欧美学者积极借鉴西方史表研究新思路,将《史记》《汉书》史表置于人类古代史表书写整体中加以辨析,拓展了从中西史学比较视野分析《史记》《汉书》史表的新空间。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也存在若干问题。其一,部分论证在严密性上有所欠缺。如方丽特将司马迁作《史记》十表与孔子作《春秋》相类比,认为两者都致力于纪念过去的人物、事件与文化制度。但其支撑这一观点的依据,只是《史记》十表与《春秋》在文本内容上都依时间顺序排列并较为简凝枯燥,在论证上难言充分。<sup>③</sup>另外,方丽特在讨论《史记》史表形态问题时,介绍了阜阳汉简《年表》的相关情况,认为假设阜阳汉简《年表》的完整形态与《史记》史表相类似,则不能将十表视作司马迁的独创性史学贡献。但由于阜阳汉简《年表》仅存残片,这一假设论证实际上并无太大意义。其二,部分观点仍可继续讨论。如,戴梅可参考印度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认为史表是一种“图像密集型”(graphically dense)历史书写的观点,将史表中的空白格栏及重复出现的历史信息视作“图像式信号”。<sup>④</sup>然而,恰如《太史公自序》自言作表的原因在于:“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sup>⑤</sup>史表的根本作用应是整合、厘清分散在不同纪年系统下的历史信息。因此,究竟是从文字组织形式角度还是图像性角度理解史表更为合宜,仍需学界继续讨论。

## 二、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对西方史学议题的回应

作为欧美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拓展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更在于将《史记》《汉书》史表引入西方史学议题的讨论,促成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

① A. F. P. Hulsewé, “Founding Fathers and Yet Forgotten Men: A Closer Look at the Tables of the Nobility in the ‘Shih chi’ and the ‘Han shu’”, pp. 75 – 76.

② A. F. P. Hulsewé, “Founding Fathers and Yet Forgotten Men: A Closer Look at the Tables of the Nobility in the ‘Shih chi’ and the ‘Han shu’”, pp. 51 – 52.

③ 戴梅可亦认为方丽特此论有牵强之嫌,因为《史记》十表与《春秋》在形式上差异太大,且《春秋》只含有一条时间线,而部分《史记》史表中并置了多条时间线。

④ 方丽特也有类似观点,如其认为《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书现象(即部分文字颠倒书写,且倒书的内容会被记于应属栏的上方一栏),也是一种“图像标记”。Griet Vankeerberghen, “The Tables (*biao*) in Sima Qian’s *Shi ji*”, pp. 303 – 304.

⑤ 《索隐》案:“并时则年历差殊,亦略言,难以明辩,故作表也。”《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3320页。

西方史学对历史书写形式曾有这样一种误解:叙事是历史学家传递历史认识、进行历史解释时不可或缺的形式手段,缺失叙事性的历史书写是有缺陷的史学形式。就此,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总结到:“现代历史编纂学得以确立的那种信念(doxa)始终认为:历史再现存在三种基本类型,即年代记(the annals)、编年史(the chronicle)和严格意义的历史(the history)。”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年代记不含叙事成分,“包含的只是一个按编年顺序排列的事件列表”;编年史只含有一定叙事的色彩,而缺乏形成叙事结构的高潮与结尾,类似一种“未完成的故事”;而年代记与编年史“由于无法获得所处理事件的充分的叙事性,从而证明了自身‘历史性’的不完善”。<sup>①</sup>

当然,海登·怀特本人并不认同这一观念——“历史学家们不一定必须以叙事形式来叙述有关实在世界的实际情况。他们可能选择其他的、非叙事的、甚至反叙事的再现模式”。<sup>②</sup>在他看来,叙事并非进行历史解释的唯一载体,年代记与编年史也并非“不完全的历史”。为了论述其观点,海登·怀特以西方中世纪史学作品《圣加尔年代记》(Annals of St. Gall)为案例,分析了缺乏叙事结构的年表同样可以承载丰富的历史意义。<sup>③</sup>

西方史学之外,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史表,也有力回应了这一问题。

其一,非叙事性的史表书写不是叙事性历史书写出现之前较为原始、粗糙的低级史学形式。戴梅可在论述《史记》《汉书》史表时指出,虽然在英语语境中“table”“list”“form”都可对应译作“表”,<sup>④</sup>但以上词义不足以令西方读者自然地理解《史记》《汉书》史表的史学功能。在她看来,近现代西方史学之所以轻视史表书写,源于两点:第一,简单地假设历史书写本身遵从单一的、从年代记到编年史再到叙述性历史的进化路线;第二,错误地将叙事结构视作达成“好的历史”的必要条件。在她看来,《史记》《汉书》史表在呈现、阐释历史时,具备叙述性历史书写所没有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当一个读者阅读《史记》《汉书》史表时,并非简单地依循时间顺序或某种叙事结构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史表中,读者的目光可以轻易地游向任何方向,质疑前后事件、相邻事件、斜线位置事件之间的关系”,从而将读者从“绑定在时间发生先后上的机械性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sup>⑤</sup>方丽特同样强调非叙事性的史表书写与叙事性历史书写在呈现历史上各有侧重,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在她看来,叙事性历史书写迫使其读者“总是必须选择一个特定的角度,或者跳过那些会使故事变得混乱而难以理解的事实”。相反,《史记》的史表书写则“迫使其编纂者列出符合其主题、格式与年代范围的所有信息”,并通过丰富的形式设计,使史表在具备全面性特点的同时,不再是枯燥的历史数据集合,进而发挥“强大的修辞力量”。<sup>⑥</sup>

其二,非叙事性的史表书写本身能够发挥独立的历史解释功能,不应将史表书写简单视作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史料来源或信息提炼。侯格睿在分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时指出,虽然《十二诸侯年表》与西方史学中的年代记(annals)、年表(chronology)一样不具备叙事性,<sup>⑦</sup>但双方存在一项根本区别:在西方史学的一般观念中,年代记与年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但

①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天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②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第2页。

③ 《圣加尔年代记》是一部记述高卢地区8—10世纪历史事件的年表,其内容分为两列,一列依次排列年份,另一列简要记载部分年份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的年份没有事件记述)。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第9—21页。

④ 大部分欧美学者以“table(s)”指代单篇或全部的史表;沙畹与华兹生则以“Chronological Tables”总称《史记》十表。

⑤ Michael Nylan, “Mapping Time in the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表”, p. 70.

⑥ Griet Vankeerberghen, “The Tables (*biao*) in Sima Qian’s *Shi ji*”, p. 304.

⑦ “年表”一词在中英对应翻译上并不清晰。如“annals”一词源于拉丁语“annus”,原意为“年”,泛指依时间顺序记述的历史书写形式,中文翻译时并无统一对应,有时也被译作“年代记”“年表”“年鉴”“编年史”。“chronology”一词主要作“年代学”之意,但也有被译作“年表”的情况。



《十二诸侯年表》却具有“十足的政治取向”。侯格睿将《十二诸侯年表》所载信息归纳为战争、首年、邦交、逃亡、征兆等 12 种分类,指出这些记载“囊括了某时期政治局势中的各类事件——战争、国家间的关系、统治家族的命运、权力的更迭”,<sup>①</sup>且这些信息中至少有 157 条不见于《史记》其他记述部分。在侯格睿看来,《十二诸侯年表》突出了司马迁史学观念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及因果关系,在解释功能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sup>②</sup>而《十二诸侯年表》超出西方纪年类型(annals genre)定义的上述特点,无疑能够拓宽西方学界对历史书写形式的既有认识。

综上可见,欧美学者辨析了《史记》《汉书》史表不同于叙事性历史书写的解释功能,并将这一认识带回西方史学有关历史书写形式的讨论之中,形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也为跳出单一文明的史学传统、全面反思人类历史书写实践做出了有益尝试。但略有遗憾的是,欧美学者并未展开分析古代中西方同样存在的史表书写,在形式与内涵上究竟有何异同?而深入研究这一话题无疑能为中西史学比较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

### 三、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延伸比较

在比较中西方古代史表书写之前,首先需要对中西史学中“史表”的含义进行简单辨析。宽泛地讲,史表即是以时间顺序排列简单历史信息的书写形式。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大事年表、年代记乃至谱系表也会被部分中西学者纳入讨论。但这一思路存在问题,即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史表书写与编年书写之间的界限。实际上,西方史学中的大事年表、年代记等历史书写,更近似于《史记》所参阅的“牒记”“春秋历谱牒”或出土文献中的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等。举例来说,古罗马较早的历史记录“大祭司年表”(annales maximi)按年份顺序依次记录长官名字及日月蚀等自然现象;其后出现的“执政官年表”(consular fasti)记载了罗马列王、在位年代及每年推选的执政官;“凯旋年表”(triumphal fasti)记载了战争中获胜将军及所败之敌的相关信息。<sup>③</sup>这类介乎于一行一列表与编年之间的历史书写,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与文明之中,在记述内容上多关注自然与社会层面上的大事——如天象变化、自然灾害、战争与执政者的更替等,在行文语言上简要凝练。它们与严格意义上的史表不同的是,只依循一条时间线索展开记述,而非通过表格形式并置不同主体各自的时间线索。

那么,西方史学中是否也有类似《史记》《汉书》史表,内含不同历史主体各自发展脉络的史学作品呢?答案是肯定的。其中的典型代表即基督教史学家恺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所著的《编年史》(Chronicle)。<sup>④</sup>

优西比乌《编年史》在序言部分总结了不同民族的历史记述与时间系统,主体部分则并列了从《圣经》亚伯拉罕开始的“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将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波斯等不同国家作

① Grant R. Hardy, “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Shih Chi* 14”, pp. 18 – 19.

② Grant R. Hardy, “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Shih Chi* 14”, p. 22.

③ 菲尔德、哈代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 1 卷,陈恒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333—334 页。

④ 优西比乌所使用的“编年史”一词原作“khronikos”,意为“有关时间的表格”(Tables concerning time)或“编年列表”(Chronological tables)。参见朱君棣、王晋新:《论世界编年史体裁在加洛林时代的延续和创新》,《史学集刊》2013 年第 3 期。优西比乌《编年史》原本已佚,现存杰罗姆(St. Jerome)翻译并续编的拉丁语版本及于 18 世纪末发现的亚美尼亚文译本。在优西比乌之前,另一位基督教史学家尤利乌斯·阿非立卡努斯(Julius Africanus)更早使用年表形式记述历史(已佚),其著作直接影响了优西比乌《编年史》的编撰。参见麦克吉佛特:《优西比乌:生平、作品及声誉》,林中泽、龚伟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58—59 页。



为题项,其表中的纪年编号是纵向的,以年为横栏单位,同时在部分年份栏位内横向记录相关历史信息。<sup>①</sup>基于此,优西比乌《编年史》将不同政权、民族的历史统合在创世纪年的时间维度之中,令读者可以直观地了解同一历史阶段内不同地域空间中的人物与事件。相较而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六国年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同样以不同的政权主体作为题项,以年为逐列的固定时间单位,将各自题项相关的历史信息记录在对应的年份栏位中,与优西比乌《编年史》除了书写方向的差异,在整体形态上可谓十分相似。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将观察范围扩大至《史记》《汉书》史表整体,则可发现其与优西比乌《编年史》有一项显著差异,即《史记》《汉书》史表内含更为丰富的书写表达类型。优西比乌《编年史》是并置不同政权的大事年表,而这种设计仅是《史记》《汉书》史表的若干类型之一。除此之外,《史记》《汉书》另有以月为单位的大事记表、世族王侯的谱系表、职官表与人物等级表等多种类型。纪传体史书中的“表”是一种复合型史学体裁,具有年历、谱牒、大事记与专门史等多重意义。不仅如此,与仅以民族、政权为观察对象的优西比乌《编年史》不同,《史记》《汉书》会将同一历史时段中的历史人物划分不同类别,分别设表,如《史记》将“建元以来侯者”与“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分设两表,《汉书》史表更是细分了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功臣、外戚、职官等不同类别的史表。

什么原因造成了《史记》《汉书》史表与优西比乌《编年史》的上述相似性呢?《史记》《汉书》史表中并置不同政权的大事年表与优西比乌《编年史》的相似性,源于两者在探索“通史”书写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相似的经验认识。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列举了此前不同历史记载的缺陷——“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sup>②</sup>侧面表达了其史表书写旨在“综其终始”“一观诸要”。其中“综其终始”要求把握不同历史主体各自的发展历程,是纵向的“通”;“一观诸要”则需要充分认识不同历史主体彼此之间的互动联系,是横向的“通”。相较而言,优西比乌想要呈现的则是一种基督教普世史观下的“通史”——“基督徒不能满足于罗马史或犹太史或任何其他局部的和特殊主义的历史;他要求一部世界史,一部其主题将是上帝对人生目的的普遍展开的通史”,<sup>③</sup>即一种从描述人类起源开始,统合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脉络的“通史”书写形式。换言之,司马迁与优西比乌在探索“通史”写作的过程中,同样面对过往历史书写形式缺乏全面性、记述内容纷繁等问题,并同样意识到可以通过表格形态,直观地搭建起通史的书写结构,从而更好地呈现历史的复杂样态与发展走向。这即是造成两者部分形态相似的原因所在。

《史记》《汉书》史表与优西比乌《编年史》等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史表在形式丰富性上的差异,又源于何处呢?窃以为,原因在于两者史观上的差异。<sup>④</sup>在基督教史学观念中,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并非人的活动,而是上帝的神意。柯林伍德对基督教史学有如下归纳:“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因为承认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无需通过任何人有意希望它发生才会发

① Alden A. Mosshamir, *The Chronicle of Eusebius and Greek Chronographic Tradition*,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5.

②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511页。

③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④ 刘家指出,中西史学传统之间存在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不同特点。其中,西方所重的是“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而中国所重的是“历时性的时间之经”,这一分析对于思考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差异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刘家:《论通史》,刘家:《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页。

生,这一点乃是理解任何历史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sup>①</sup>在这个意义上,史家的工作即是通过呈现历史发展过程来展示上帝目的的实现,而非探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恰如《时间制图学》一书对优西比乌《编年史》的总结:“优西比乌的历史样貌传达了一条核心教训。各自统治部分世界的多个王国都随着时间消失了。历史汇聚成一则单一的故事,即罗马如何恰好及时地统一了世界,从而使所有人得以认识弥赛亚。换言之,《编年史》不仅仅是一种清晰易懂的历史记载。它是神意历史的动态象形文字。”<sup>②</sup>在已然预设了从创世纪到末日审判的人类发展历程之后,秉持神意史观的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史表只需尽可能全面地、依时间顺序不断延续记述,而无需在书写形式上多做变化。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史记》《汉书》史表蕴含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及从“变”中理解历史的史学观点。虽然《史记》《汉书》史表中经常发出“岂非天哉”“岂非命哉”的感慨,表面看来有一定天意史学的色彩,但这里的“天”与“命”更近于指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sup>③</sup>《史记》《汉书》史表致力于从历史之“通”中把握历史之“变”,所谓“录其事而见之”,<sup>④</sup>即通过记述国家、世族及个人在历史中的兴衰荣辱,引导读者思考历史趋势、总结历史教训,从而“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sup>⑤</sup>又言“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sup>⑥</sup>也点明了《史记》《汉书》史表具有褒贬、教化的史学意图。正是为了达成从“通”中知“变”的史学目的,《史记》《汉书》创立了多种形式、多种观察角度的史表类型,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史表的、丰富多样的史表书写。

## 结 语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学者在尝试了解中国史学的过程中,关注到独具特色的《史记》《汉书》史表,随着相关分析的逐渐深入,不仅加强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更促成了对西方史学自身的有益反思。《史记》《汉书》史表及其从属的纪传体历史书写,是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史学实践,从史学文化层面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切入中外文明比较时,中国传统史学的潜在能量不容小觑——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发展历程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从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比较中进一步拓展中西史学比较,加强中西史学互鉴,仍待继续深入。

(作者庄亚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 苑)

①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49页。

② Daniel Rosenberg and Anthony Grafton, *Cartographies of Time: A History of the Time line*, pp. 26 - 27.

③ 刘家和曾以《孟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理解司马迁“岂非天哉”的感慨,认为司马迁并非离开人事而谈天命,而是强调“人事的后果”往往不是主观可预料乃至决定的。刘家和:《“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刘家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第62—63页。

④ 《史记索隐》引应劭所言:“表者,录其事而见之。”案:“《礼》有《表記》,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史记》卷13《三代世家》,第487页。

⑤ 《汉书》卷14《诸侯王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6页。

⑥ 《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3页。

---

**From Social History to Cultural History: An Analysis of Reformation Studies by Susan C. Karant-Nunn // Fu Liang**

As a renowned historian of German Reformation, Susan C. Karant-Nunn, who was influenced by sociology, Structuralism, Marxism, and social historians such as Bernd Moeller, Robert W. Scribner as well as Natalie Zemon Davis, embraced the social history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Reformation in the 1970s – 80s. Her early works delved into the changes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the rural and territorial cities of Saxony and Thuringia in the Reformation period. They exemplified the merits of a kind of historiography that combines a closing reading of the sources with innovative methodologies. Yet adopting social history has run the risk of being too reductionist in reading of religious belief as mere signifie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oncerns and of failing to understand past societies, especially religious societies, on their own terms. On this aspect, cultural history has restored the ideation, taking doctrines and beliefs not necessarily at face value, but more empathetically, with emphasis on the assertion that ideas shape reality, or at least shape people's perception of reality. The cultural turn in Reformation history took place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Karant-Nunn accepte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d tried, with "thick description", to analyze ritual and emotions in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Her innovative methodology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A Discussion of Studies on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able Writings // Zhuang Yaqiong**

The Study on tables of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Hanshu* (*Book of Han*)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n exemplar case through which domestic academic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distinguish and analyz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ross-cultur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the inception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of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hav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in depth and width, exhibiting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fully emphasiz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ual criticism,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scope of discussion, and references to some aspects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Som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used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to challenge the prejudices against non-narrative historical writing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which facilitated the in-depth cross-cultur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However,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have not provided a thorough 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writings of tables. By comparing the *Chronicle* by Eusebius of Caesarea with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ical concepts in general history writing in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sisting on writing about divine views in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Western table writing in medieval times failed to diversify its genres to capture changes in history.

**The Crisis in Modern Niger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70s – 1980s and Its Response // Wang Yan**

Nigeria occupies a vital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This country is not only know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birthplaces for contemporary African history, the Ibadan History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y are beyond doubt. Nevertheless, since the middle of 1970s, Nigerian historiography has undergone a grave crisis in the organizations of history, the enrollment of history majors, and the disbelief in the social value of history. In reflecting on history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themes, Ni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ians attempt to theorize this crisis. They argue that the crisis is a result of combined forces including defects of nationalism historiography in its themes and methodology, and government's policies that neglect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istorians respond to this crisis in a way to change the practice of empiricism in the past a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historiography. They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expand the themes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to ethnic relations, economic histo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other research topics closely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African affairs, improve the research methods.

**"Post-Post-Zionism" and the New Trend of Israel's Nation-State Narratives // Zhang Qianhong, Han Boya**

A group of Israeli intellectuals have re-examine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raeli nation